

# 韓中儒教文化認知：唐前“四史”韓半島文獻源流 疏證及現代闡釋\*

李劍清\*\* · 梁釗\*\*\*

## 目 次

- I. 序論
- II. 《史記》《漢書》韓半島文獻源流疏證
- III. 《三國志》《後漢書》中韓半島文獻源流疏證
- IV. 唐前韓半島文化認知特徵與意義

## 【摘要】

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資料是東亞儒教文化圈的歷史書寫。對韓國而言，這些屬於一種“域外之文獻”。本文對唐前“四史”的韓半島文獻進行源流疏證與現代闡釋，認為唐前韓半島文化認知有三個的基本特徵：一、從文獻增量看，相較于《史》《漢》而言，《三國志》《後漢書》中關於韓半島文獻的累增性，體現了對韓半島文化認知的漸進性特徵；二、從敘事模式上看，唐前“四史”中的《史記》《漢書》延續著“在重大歷史事件中展現人物性格、命運”的敘事模式變為《三國志》《後漢書》中的“山海經”敘事模式，體現了對韓半島文化認知維度的更新性特徵；三從地理空間格局來看，唐前“四史”對韓半島地理空間的認知發生了兩

\* 본 논문은 2015년 “중한문화의 인지와 대화” 국제학술대회에서 발표한 뒤, 수정 및 보완하였다.

\*\* 中國 寶雞文理學院 副教授

\*\*\* 慶北大學 國語國文學科 博士課程

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具體說，一是司馬遷首次將韓半島納入史學視野之中，形成了“漢四郡”地理空間的認知。二是陳壽《三國志》中將高句麗、東沃沮、三韓等地囊括其中，擴大了對樂浪郡(今屬朝鮮)周邊地域的認知。20世紀初，中韓兩國雖已超越了朝貢關係，但兩國在文化上依然同根同源，是東亞“儒教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唐前韓半島文化認知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現代價值：一、對於韓半島文化而言，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是韓國文化悠久性的一大確證。二、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是理解中韓文化的同源性一大鏡像。三、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是中韓文化交流的見證。總之，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成為理解東亞儒教文化的同源性，實現中韓文化對話的基礎。

**關鍵字**

儒教文化圈；唐前“四史”；韓半島；三韓古國；認知格局；中韓文化交流

## I. 序論

近代以來，隨着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既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又引發了因“文化衝突”而造成的民族性、地區性的政治——軍事衝突。如基督教與伊斯蘭原旨教的文化衝突，引發的國際恐怖主義襲擊事件。筆者認為，“文化認知”與“文化對話”，不僅是解決“文化衝突”的不二法門，也是重構“同源文化圈”的一大法寶。因為，“文化認知”與“文化對話”相輔相成的，“文化認知”目的是為了實現“文化對話”，而“文化對話”才能更好的“文化認知”。只有深度的“文化認識”與“交流對話”，才能有效解決因文化差異帶來的政治——軍事衝突。中韓文化，同根同源。中韓文化認知與文化對話，對重構東亞儒教文化圈意義重大。正如葛兆光先生說的“應當承認，近二十年來，日本、韓國、中國的一些學者重提‘亞洲’，在某種意義上說，有超越

各自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重新建構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對外抵抗‘西方霸權’的意義。”<sup>1)</sup>

中韓兩國，一衣帶水。兩國關係，素有唇亡齒寒之說。古代中韓兩國就在以儒教文化為核心下進行文化交流。作為宗主國的中國歷朝，以極為開放的文化心態，向朝鮮朝進行無私的文化輸出與文化輻射。朝鮮朝對華千餘次的“遣使”行為，讓韓國成功地融入到“儒教文化圈”之中，提升了本國的文化水準，促進了兩國文化的持續交流與深度發展。如今，韓半島因“使華”，留下各種資料竟達600餘種，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寶庫，為研究兩國的歷史、文化、地理、氣象等提供了寶貴的資料。20世紀以來，中韓兩國雖然在政治關係上已經超越了朝貢體系，按照現代國際秩序政治運作，但兩國在文化上依然同根同源，是東亞“儒教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如此，中韓仍然還存在著較多的文化差異。這就需要兩國人民在“睦鄰友好、相互尊重、和而不同、攜手發展”的現代理念下進行“文化認知”與“對話交流”。

唐代以來的中韓文化交流與遣使行為久矣，而唐前兩國文化交流的資料較少。就韓國學界而言，《三國史記》與《三國遺事》等高麗時期編纂的資料成為了“唯一”標準。那麼，在面臨兩國文化相互認知的課題前，中國方面資料的探究顯得尤為重要，特別是唐朝以前的資料對研究兩國文化認知等方面可謂雪中送炭。因此，筆者正是在此問題意識下，梳理唐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中關於韓半島的文獻記載，試圖分析西元前11世紀至西元7世紀中國對韓半島的文化認知與交流的歷史圖景，以彌補研究唐前中韓文化認知的缺陷。

特別要說明的是，現實境遇下的韓半島，朝鮮與韓國因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不同而南北對峙，甚至劍拔弩張。為了避免國際政治的糾紛，本文無意以當前任何一個國度——無論朝鮮還是南韓——來指代韓半島。同時，又不忍心以現代國家為

---

1)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構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華書局，2011，第11頁。

藩籬來宰割歷史，丟棄韓半島北部。因為，在中國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中韓的文化認知與交流是借助韓半島北部的陸路實現的。捨棄韓半島北部的陸路，直接言說唐前中韓文化認知與交流，既違背了唐前“四史”所涉及的地域空間與歷史圖景，也無形中加深了南北韓兩國因政治對峙導致的文化分裂。以此本文考慮到唐前“四史”所涉及的地域空間與歷史圖景，將研究物件統一稱呼為“韓半島”。

## II 《史記》《漢書》韓半島文獻源流疏證

早在先秦時代，具有巫術性質的《山海經·海內北經》中就“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sup>2)</sup>等有關韓半島的記載。可惜很難從“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的《山海經》一書中，清晰呈現出戰國方士對韓半島的認知圖景。真正拉開認知韓半島序幕的是史聖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在《史記》中開闢了《朝鮮列傳》，將韓半島北部的廣大區域納入認知視野。

司馬遷真不愧是史聖，將“互文並見”的史筆運用地爐火純青。首先，司馬遷將先秦典籍中零星的朝鮮文獻放置在《宋微子世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中的“箕子分封朝鮮”，看似閑來之筆，卻熠熠生輝。《史記·宋微子世家》曰：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sup>3)</sup>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中“考證”：

“尚書大傳雲：武王勝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於十三祀來，與此異。”<sup>4)</sup>

2) 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374頁。

3)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1620頁。

儒教經典《尚書》中就有“箕子封朝鮮”的故事，將朝鮮納入西周封國。司馬遷並未給箕子立傳，只附載于《宋微子世家》之中。而且，在處理“箕子封朝鮮”史料上，不惜改變史實，完成歷史意味的書寫。司馬遷在《宋微子世家》中，將“箕子封朝鮮”安排在“箕子答武王洪範之問”之後，似乎有意傳遞一種歷史訊息。通過的上下文語境，我們能感覺到箕子之所以被封朝鮮，是因為完美地回答了武王的“殷亡”之問。這既彰顯了周武王的大度與謙虛，又凸顯了箕子的機智與氣節。實際上，司馬遷特別表彰箕子所代表商文化。故而，司馬遷有箕子“不臣”之說。而瀧川資言借助《尚書》史料，呈現了歷史真實，批評司馬遷的歷史錯誤。瀧川資言還原了箕子走朝鮮的真實情況：箕子私自走之朝鮮，周武王聽聞之後，正式追封箕子於朝鮮。瀧川資言為後世廓清西元前11世紀朝鮮的文化認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其次，司馬遷將漢代以來的官方檔等編纂成《朝鮮列傳第五十五》，成為認知韓半島的重要文獻。司馬遷為什麼不把“箕子封朝鮮”的史料寫進《朝鮮列傳》呢？這恐怕與他的著述意圖有關。《太史公自序》中清清楚楚地交待了著述《朝鮮列傳》的真實意圖：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做《朝鮮列傳第五十五》。”<sup>5)</sup>

既然要重點記述西漢開國以來與朝鮮的政治關聯，司馬遷自然略去了箕子封朝鮮的記載，直截了當溯源戰國燕人侵佔真番、朝鮮等地，納入燕國版圖。秦統一之後，韓半島的相關地域，成為“遼東郡轄區以外的邊界或郭塞。”<sup>6)</sup>西漢開國後，將遼東故塞至涇水的地域封于功臣燕王盧綰。盧綰叛漢之後，逃入匈奴境。故燕亡

4) 瀧川資言. 史記會注考證【M】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99，2351頁。

5)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3317頁。

6) 劉子敏，《遼東外徼考釋》，《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02期，44頁。

命之人衛滿趁機招聚黨徒越過涇水，佔據朝鮮等地，自立為王。漢惠帝、高後時代，迫于天下初定，尚不足平定，只好懷柔，認同其合法性，建立宗藩關係。司馬遷重點記述了衛滿之孫——右渠王與漢武帝的戰爭以及結果。我們相信，衛滿立國、確立宗藩、以及右渠與漢戰爭等，有大量的漢王朝官方檔，太史令司馬遷有機會見過這些官方檔的。因此說司馬遷是據漢代以來的官方檔等編纂成《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而司馬遷在《朝鮮列傳》中，詳細記載了漢武帝發兵伐將朝鮮的史實。“漢四郡”納入西漢疆土，實際上是儒教大一統政治體系歷史書寫。

班固《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中記載朝鮮之事，除將西南夷、兩粵與朝鮮合傳之外，與朝鮮史實上並無增補，幾乎全部因循《史記·朝鮮列傳》的史實，而且賡續了司馬遷《史記·朝鮮列傳》的儒教大一統政治體系。

如何看待班固的照單全收呢？首先，班固高度認可司馬遷關於朝鮮的史料取擇及編排方式，這進一步證明了司馬遷的史家聖手地位。其次，作為東漢的蘭台令，班固應該能見到武帝之後的官方檔，他卻未加補充。也許他覺得昭帝合併四郡的史料應該歸《地理志》。因此，班固的最大功勞是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玄菟、樂浪兩郡的戶籍、人口以及下設縣名地望。

當然說，班固在朝鮮史料上並無絲毫增補也是不嚴謹、不科學的。細細尋繹，班固的史料增補僅四處：

一是班固在《地理志》中補述出箕子適朝鮮後的更多資訊，如定制禮儀，教民力田養蠶、紡織之事，制定教民八條等。

《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儀、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

二是衛滿姓氏問題。司馬遷《朝鮮列傳》只言“朝鮮王滿，燕人也”，行文中皆

稱其名不言其姓。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載：

“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而自王之。”<sup>7)</sup>

王先謙《漢書補注》曰：

“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是小司馬所見本異。”<sup>8)</sup>

其實何止沒有“姓衛”兩字，連“擊破朝鮮而自王之”一句亦不見於今本《漢書》。如果唐司馬貞所見之《漢書》確屬班固《漢書》異本的話，那麼，班固倒有補出朝鮮王滿的姓氏的功勞。

三是班固補出“漢四郡”的具體名稱。司馬遷《史記·朝鮮列傳》只稱“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sup>9)</sup>。平定朝鮮，置四郡是武帝朝開疆拓土的盛事，司馬遷豈有不知道四郡具體名稱之理？司馬遷認為人人皆知，故而略而不言。隨之事異時移，後世不能詳之，故而班固《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補出這一信息：

“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sup>10)</sup>

四是班固補出“辰國”這一信息。我們先看班固在何處補出“辰國”的？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載：

“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有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弗通。”<sup>11)</sup>

司馬遷《史記·朝鮮列傳》中這樣表述：

“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有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sup>12)</sup>

7)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2985頁。

8) 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749頁。

9)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2989頁。

10)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3867頁。

11)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3864頁。

比較一下，班固改《史記》中的“真番旁眾國”為“真番、辰國”，這與無異於在司馬遷的基礎上補出了“辰國”資訊。這個意義非同尋常啊！因為，關於韓半島南部的“古辰國”，尚未出現在司馬遷的視野之中。司馬遷本有機會涉及辰國，但一句“真番旁眾國”略過。我們很難印證司馬遷的疆域觀念中是否有韓半島北部的“古辰國”，倒是班固補出“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顏師古注“辰謂辰韓之國也。”雖然班固並不瞭解也未更多地介紹辰韓古國的社會訊息，但他使辰韓古國終於呈現在東漢的史學版圖和思想世界，“辰國”被首次被認知。

### Ⅲ. 《三國志》《後漢書》中韓半島文獻源流疏證

按時代講，東漢先於三國，但《三國志》成書於西晉，而《後漢書》則成書於南朝劉宋時代。因此，關於韓半島文化認知的序列應該是先《三國志》而後《後漢書》。

#### (一) 陳壽《三國志》中的韓半島文獻

##### 1. 韓半島上古史文獻

陳壽在記述濊國以及三韓時，除了運用《史記·宋微子世家》《漢書·地理志》中的相關史料外，還能見到同時代或稍前的《魏略》中有關資料，追述箕子治朝鮮以

---

12)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2986頁。



及後嗣故事。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

“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裡，止滿番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並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准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于涿水，及綰返，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涿水，詣准降，說准求居西界，收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准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多，乃詐遣人告准，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准，准與滿戰，不敵也。”<sup>13)</sup>

在《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中，陳壽筆則筆之，削則削之，突顯了箕子治朝鮮的效果。簡要記述了箕子稱王，以及燕人衛滿魍結夷服自立為王的史實，刪去了魚豢《魏略》中的枝蔓。尤其是講述三韓之馬韓立國的淵源，系朝鮮侯箕子被衛滿所敗，攜左右入海居韓地，建立韓國。至此，馬韓立國情形首次清晰呈現出來。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余世，朝鮮侯准(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魍結夷服，復來王之。”<sup>14)</sup>

“侯准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sup>15)</sup>

13)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850頁。

14)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848頁。

15)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850頁。

陳壽《三國志》此段文獻記載，卻有補《史記》《漢書》朝鮮傳之缺。亦可糾清儒齊召南、王先謙之失。王先謙《漢書補注》注引清代齊召南《漢書考證》：

“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准始稱王。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准而自立。後書傳正補此傳之缺。”<sup>16)</sup>

齊召南認為《後漢書》補《漢書》之缺，王先謙引證之以示認同。但事實上陳壽《三國志》成書早於《後漢書》，範曄著《後漢書·東夷傳》不過是“蕭規曹隨”而已。

## 2. 韓半島北部——高句麗、東沃沮、濊貊等

陳壽《三國志》中的《烏丸鮮卑東夷傳》的確呈現出比《史記》《漢書》更為闊大的格局。可以說，陳壽在《東夷傳》中撰次地涉韓半島的高句麗、東沃沮、濊貊以及三韓等國，打破了《史記》《漢書》的“朝鮮四郡”的地理空間格局。

陳壽採取了《山海經》的敘事方式，介紹高句麗、東沃沮、濊貊等地理方位、毗鄰區域、自然環境、風俗習慣、物產所出、官制組織，以及與東漢、曹魏時代的政治、外交、軍事等。儘管這些文獻中會有訛誤，比如記載東沃沮時，誤將濊國地理的史料竄入其中，但我們應該肯定陳壽“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功勞。

## 3. 韓半島南部——三韓

如前所述，班固《漢書》中雖出現“辰國”，但並未過多記載“辰國”情況，等到了陳壽《三國志》“東夷傳”中，詳盡展現了三韓——馬韓、辰韓、弁韓的地理位

---

16) 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748頁。

置、疆域、人口、風俗習慣，以及部落王國等。盧弼《三國志集解》引《滿洲源流考》卷二，讚頌陳壽《三國志》“備載其國”的功勞，“三韓統名辰國，自漢初已見，後為新羅、百濟所並，其七十八國之名，備載于《魏志》。”<sup>17)</sup>

儘管清末丁謙據《東藩紀要》批評說：“是三韓有國，均在西漢之世，至東漢初，三韓已亡，何論曹魏！陳氏此傳，作于晉初，乃任言三韓事，若不知有百濟、新羅者，何也？”<sup>18)</sup>無論陳壽是否明白東漢之後，三韓之國歸於百濟、新羅，但他詳盡呈現了三韓社會生活情況。尤其是關於辰韓人的來源，陳壽記載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sup>19)</sup>

這是全新的文獻，而且陳壽運用辰韓耆老傳世之言以及日常用語，確證辰韓先民系秦帝國時代逃避勞役徭役的秦人（應該屬陝西關中人）。儘管當代學者楊萬娟教授在《韓國文化與中國楚文化淵源初探》一文中認為韓國文化主流與楚文化有千絲萬縷的淵源關係，但她並沒有否認辰韓先民系“秦朝時逃亡過來的中國人”的觀點。<sup>20)</sup>

綜上所述，陳壽在《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中詳盡保存了韓半島的文獻。其文獻來源有三：一是整齊《史記》《漢書》中的零星文獻，以及同時代稍前的《魏略》中有關韓半島的歷史文獻。二是東漢、曹魏兩代保存的有關韓半島的原始的官方文件。三是陳壽“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所獲得的民俗學、人類學等文獻資

17) 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243頁。

18) 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245頁。

19)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852頁。

20) 楊萬娟，《韓國文化與中國楚文化淵源初探》，《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料。陳壽在編排民俗學、人類學文獻時，基本上沿用了《山海經》的敘事模式，以某一地域為參照點，詳盡記述其自然環境、物產、風俗、官制等；在處理前史資料和官方檔時，則因襲《春秋》《左傳》等編年體，將韓半島的歷史事件按時間次序編排起來。當然，值得注意的是，陳壽編排采輯民俗學、人類學文獻是印證儒家所嚮往“俎豆之象”的“儒教禮樂文化理想”。“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已接前史之所未備焉。”<sup>21)</sup>由此可見，陳壽認為韓半島諸國雖為外夷，但與諸夏文化是同源。這已經充分揭示了中國儒教文化不以“血統”，而是以一一衣冠服飾、俎豆等器具為載體的“禮樂文化”來區分“夷夏”的特徵。<sup>22)</sup>

## (二) 範曄《後漢書》中的韓半島文獻源流

陳壽《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不僅開拓了《史記》《漢書》“朝鮮傳”中的地理空間格局，而且奠定了範曄《後漢書·東夷傳》的敘事格局。當然，範曄將《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的“合傳”列為“單傳”，獨立成《東夷傳》。

在敘事格局上，範曄《後漢書·東夷傳》因循了陳壽《三國志》，記載了地涉朝鮮北部的高句麗、東沃沮、濊國，以及朝半島南部的三韓之國；在敘事方式上，範曄繼承了陳壽的《山海經》敘事模式，將人類學、民俗學和史學文獻等資料融為一爐；在文獻取舍上，範曄基本上收錄了陳壽《三國志》的文獻史料。當然，根據《後漢書》斷代史的需要，範曄不得不以“減法”的方式，裁剪割捨了《三國志·烏

21)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840~841頁。

22) 參見葛兆光《宅茲中國——重構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的“在充滿自信的古代中國，很多儒家學者一直傾向於夷夏之間的區分在於文明，不在於地域、種族”的論述。中華書局，2011，第46頁。

丸鮮卑東夷傳》中有關曹魏時代的史料。同時，修正了陳壽偶然的史料錯誤，如範曄“刪單單大嶺之東一段，移入《濊國傳》，位置較合”<sup>23)</sup>。當然，範曄也有錯誤理解陳壽史料而導致的大誤之處！如將陳壽在敘述“高句麗”時附載的“小水貊”，誤以為是高句麗之別種。清代學者丁謙已辨析清楚，“因中國往高句麗，道必經此，故陳壽《魏志》高句麗傳附載其名。此部微末，除出好弓外，別無他事可紀。其下所書，仍是高句麗事。范蔚宗既本陳志為高句麗傳，又截取小水貊為一傳，大誤！”<sup>24)</sup>

#### IV. 唐前韓半島文化認知特徵與意義

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是儒教朝貢文化體系下的歷史書寫，呈現出西元前11世紀至西元7世紀的中國對韓半島的文化認知與文化交流的基本圖景。總體而言，唐前韓半島文化認知表現出三個特徵：

(一) 從文獻增量看，相較于《史》《漢》而言，《三國志》《後漢書》中關於韓半島文獻的累增性，體現了對韓半島文化認知的漸進性特徵。

具體而言，《史》《漢》記載了秦漢時代朝鮮王室的形成、世系更替，尤其重點記載了武帝朝與朝鮮戰爭過程以及結果。而《三國志》《後漢書》不僅補出了屬於漢王朝、曹魏王朝疆域的朝鮮歷史，如箕子治朝鮮，四十世後裔的箕准失國，衛滿自王朝鮮，箕准入海逃至馬韓為王以及漢武帝伐滅朝鮮等，還補出了地涉韓半島北部的高句麗、東沃沮，韓半島中部的濊貊，韓半島南部的三韓等歷史文獻和輿地

23) 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232頁。

24) 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226頁。

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文獻。因此，從歷史事件文獻到輿地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文獻的激增，既是不同時期的諸夏王朝認知韓半島的結晶，也符合文化認知的漸進性規律。

(二) 從敘事模式上看，唐前“四史”中的《史記》《漢書》延續著“在重大歷史事件中展現人物性格、命運”的敘事模式變為《三國志》《後漢書》中的“山海經”敘事模式，體現了對韓半島文化認知維度的更新性特徵。

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的敘事新體例，這種敘事體例創立了“在重大歷史中展現人物性格、命運”的敘事模式。司馬遷面對漢武帝朝中的中朝戰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以及不少的官方檔，經過一番忖度之後，選用了“列傳”的方式記載朝鮮。因為在這場戰爭中涉及的人物，如朝方的右渠王，中方的漢武帝、漢王朝使者涉何、左將軍楊僕、樓船將軍荀彘等人。這種敘事模式有利於揭示中朝戰爭的緣由，以及軍事行動中的挫折與結果。到了東漢時代，班固著《漢書》時，將漢武帝發動中朝戰爭所帶來的結果——開拓出的疆域，納入到《地理志》之中，而將戰爭的過程依然用“紀傳體”方式記載出來。隨著後漢、三國時代與韓半島的文化往來頻繁，大量的輿地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文獻的湧現。陳壽《三國志》“東夷傳”採用“山海經”的敘事模式，更有效地將輿地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文獻編織起來。因此，相較於《史》《漢》而言，《三國志》《後漢書》“東夷傳”的敘事模式的變化意味著認知維度得到了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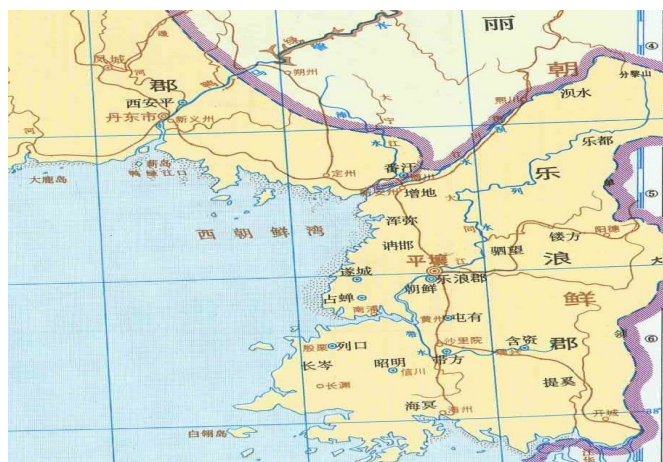
(三) 從地理空間格局來看，唐前“四史”對韓半島地理空間的認知發生了兩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具體說，一是司馬遷首次將朝鮮納入史學視野之中，形成了“漢四郡”地理空間的認知。二是陳壽《三國志》中將高句麗、東沃沮、三韓等地囊括其中，擴大了對樂浪郡(今屬朝鮮)周邊地域的認知。陳壽《三國志·東夷傳》記載了濊貊國于東漢時代尚未納入中國版圖，至曹魏時代舉邑而降的史實，範曄《後漢

書》因循其後。因此說，陳壽《三國志》打破了國家疆域版圖的界限，將地涉朝鮮半島的高句麗、東沃沮以及三韓等國納入到認識視野之中。從以下三幅地圖所呈現出的地理空間格局看，唐前韓半島認知的格局具有開拓性特徵。



〈圖 1〉西漢時代幽州刺史部之朝鮮四郡<sup>25)</sup>

25)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2。



〈圖 2〉東漢時代之樂浪郡<sup>26)</sup>



〈圖 3〉曹魏時代之韓半島地圖<sup>27)</sup>

26)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2。

27)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2。



如今，中韓兩國早已超越了朝貢關係，我們如何從現代立場看待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的現代價值呢？我們在“睦鄰友好、相互尊重、和而不同、攜手發展”的現代國際理念下反思其意義，大約有三：

(一)對於韓半島文化而言，唐前“四史”中關於韓半島文獻是韓半島文化悠久性的一大確證。僅從先秦時代的《山海經》中出現的“朝鮮”地名以及先秦古籍《尚書》中記載了箕子走朝鮮的故事，就可以確證韓半島歷史文化的悠久與華夏諸國存在著儒教朝貢關係。尤其是《史記》《漢書》記載“箕子封朝鮮”與“箕子作八條之教”，以及《三國志》記載箕子南走辰韓的史實，都是韓半島歷史文化悠久的確證。至於韓國桓君神話，雖追溯的時代更為久遠，但這些神話極可能是後世“層累地製造古史”的結果。這些神話並未見於唐前“四史”朝韓文獻之中。當然，我們相信韓半島在遠古時代就生活著不同土著部族，正是箕子封朝鮮、以及西漢初年的衛滿建立朝鮮國和箕子南走辰韓稱王，使韓半島的地理空間、圖騰信仰、風俗習慣、社會生活等呈現在中國史學視野之中。反過來看，唐前“四史”所記載的韓半島文獻恰恰是韓半島悠久歷史文化的確證。

(二)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是理解中韓文化的同源性一大鏡像。對於韓國而言，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不僅是“域外之文獻”，也是認知韓半島文化的一大鏡像。儘管拉康的“鏡像理論”是針對前語言期的幼兒的認知領域，“正如照鏡子的情況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基本上是自戀式的，由於看到‘自我’意象被世界中的某一客體或個人反射回來，我們獲得一個‘自我’的感覺。這一客體(包括人)既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自我的一部分——我們與它認同——然而又不是我們的自我，而是某種異己之物”<sup>28)</sup>，但他的理論可以啟發我們，將唐前“四史”韓半島文獻視為認知朝韓文化的“鏡像”。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不僅記載了殷商貴族箕子以及後裔箕

---

28)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80页。

准立國朝鮮，還記載了漢初衛滿攻破朝鮮自立為王，衛滿之孫——右渠王失國以及朝鮮成為“漢四郡”。這表明古朝鮮的土著部族受到諸夏文化的薰陶，甚至成為漢王朝的子民。至於唐前“四史”中的三韓文獻，不僅記載箕准失國南走馬韓為王，還記載了秦朝人遷徙至辰韓的史實。正如中華民族並非完全以血緣為紐帶，而是以禮樂文化為紐帶形成的一樣，朝鮮半島土著民族與遷徙而來的諸夏之人逐漸融合，接受了禮樂文化的洗禮，這才引發了陳壽的“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的感慨！因此，中韓文化上具有悠久的同源性。

（三）唐前“四史”中的韓半島文獻是中韓文化交流的見證。唐前“四史”中記載了大量的中國與韓半島國家文化交流的史實。《三國志》記載“漢時賜鼓吹技人”於高句麗、高句麗遣使朝貢以及漢桓帝時代濊貊獻“果下馬”等史實，更記載了人口遷徙，既有從中國遷入韓半島，也有從韓半島突入中國的現象。比如高句麗“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再比如“桓、靈之末，韓濊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當然，文化交流的一種極端方式——戰爭，唐前“四史”也是比比皆是。無論是極端方式的戰爭、還是友好的朝貢，都促進了中國與韓半島的文化交流。因此，作為官方史籍的唐前“四史”韓半島文獻成為中韓文化交流的偉大見證。

總之，唐前“四史”韓半島文獻成為認識中韓文化同根同源的基础，也是認識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基础。通過重構东亚地域的“儒教文化圈”，有利於超越近代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對抗西方文化霸權。

## 參考文獻

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99.
- 劉子敏，〈遼東外徼考釋〉，《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02期.
- 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楊萬娟，〈韓國文化與中國楚文化淵源初探〉，《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1期.
- 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Abstract

Be Aware of Korean Chinese Confucianism Culture: Analyzing the Korean's Literature Origin of the Four Famous History Books in Pre-Tang Dynasty and Demonstrating its Cultural Cognition

Li Jianqing · Liang Zhao

Rooting from Chinese Pre-Tang Dynasty, China-Korea cultural cognition literature, for the South Korea, is foreign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Koreans' Literature Origin of the Four Famous History Books in Pre-Tang Dynas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at the Two Korea's cultural cognition before Tang Dynasty has these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cognitive historical data is progressive. Secondly,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is renewal. Finally, the cognitive pattern is pionee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al cognition has three important points: Firstly, for Korean culture, the Four Famous History Books in Pre-Tang Dynasty confirms the Korean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Secondly, the Korean literature is the mirror to understand the homology of China-Korea culture. Thirdly, the Korean literature is the witnes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Key Word

The Four Famous History Books in Pre-Tang Dynasty,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Three Korean Ancient country, The Cognitive Pattern, 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 논문투고일 : 2016.7.1. 심사완료일 : 2016.8.5. 게재결정일 : 2016.8.17.